

薛永武 著



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·重点项目
中国海洋大学“985工程”海洋发展人文社会
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

中国文论经典流变

《礼记·乐记》的接受史研究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·重点项目
中国海洋大学“985工程”海洋发展人文社会
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

中国文论经典流变

《礼记·乐记》的接受史研究

薛永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论经典流变:《礼记·乐记》的接受史研究/薛永武著.
—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2.4
ISBN 978-7-5097-2561-0

I. ①中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乐记-研究 IV. ①J609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2412号

中国文论经典流变

——《礼记·乐记》的接受史研究

著 者 / 薛永武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责任编辑 / 闵佳 张君 刘荣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

责任校对 / 孔军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总 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印 装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/ 10.5

版 次 / 2012年4月第1版

字 数 / 283千字

印 次 /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2561-0

定 价 / 39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

引 言

中国古代经典浩如烟海，星光灿烂，可谓人文精华荟萃，值得我们着力汲取智慧，以求发扬光大；而中国文论经典则是中国古代经典特殊的明珠，闪耀着先人的美学智慧，值得我们费时耗力去爬罗剔抉。其中，《礼记》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，也是儒家经典文献的集大成者，而《乐记》虽然是《礼记》的一篇，却以其完整的结构和深刻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，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经典，也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，生生不息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故此，拙著以《中国文论经典流变》为书的正标题，以《〈礼记·乐记〉的接受史研究》为副标题，展开对问题的研究。

《礼记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内容涉及哲学、人才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管理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教育学、美学、文艺学、音乐学、外交学、游戏学、风俗学、地理学、生态学和农学等诸多方面。在全球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氛围下，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当下视阈，面对后现代解构与消解权威的喧嚣，我们以理性的目光，重新审视中国经典文本《礼记》及其文论经典《乐记》，深刻感受到古人所拥有的诗性智慧。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，这些经典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光辉绚烂，历久弥新，颇有“日日新”的生命张力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现代转换以及当代文艺创作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作为具有经典意义

的《礼记》，无疑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不仅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，而且还将继续影响着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发展；尤其是《礼记》中的《乐记》，在中国文论史和美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经典作用，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重要源头，它不仅影响了中国文论史和美学史，而且也继续影响着当代的文艺建设、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。即使在未来社会，《乐记》也会以其思想的深刻性、普适性和永恒性，而被历史所瞩目。对于《乐记》的阐发，既要看到它的经典地位及其丰富内涵，又要看到它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，才能管窥其旺盛的生命力。因此，笔者把对《乐记》的形成与接受纳入中国文论发展史的角度予以考察，力求从发展的观点来解读《乐记》的动态价值。

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，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历史的需要，对《礼记》的研究与时俱进，对经典文本不断进行新的阐释，就会发现前人和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意蕴。而对于《乐记》来说，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，文艺和审美将会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《乐记》的参考和指导价值也将日益凸显出来。如果说朗吉努斯的《论崇高》被后世誉为“像黄金一样宝贵”，那么，我们也可以说，《乐记》是中国美学史乃至世界美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我们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需要多维的视角，唯有把辐射思维和辐集思维结合起来，才有可能克服我们主观视野的各种遮蔽性。

著名美学家蒋孔阳认为，《乐记》在我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史中，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，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、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，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相媲美。蒋孔阳所著《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》一书有《评〈礼记·乐记〉的音乐美学思想》一文，他高度评价《乐记》“把儒家的‘礼乐’思想加以丰富和系统化，成为先秦儒家‘礼乐’思想的集大成。如果说，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，是根据盛行



于希腊时的史诗、悲剧和喜剧等艺术实践，对于古代希腊美学思想的总结，而‘雄霸了二千年’，那么，《乐记》则是根据我国先秦时包括歌、舞在内的音乐艺术实践，对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，从而在我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……二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，有关文学艺术的美学思想，从《毛诗序》开始，一直到晚清各家论乐的观点，基本上没有超过《乐记》所论述的范围。因此，《乐记》在我国音乐美学思想发展史中，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，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、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。这样，我们就不能不特别重视了”^①。

愚以为，《乐记》固然是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，但也是礼乐文化理论的纲领性文献，对于后世的文艺建设乃至文化建设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在宏观层面上，它以和合哲学为宏大的视野，以“明于天地”为先导，通过构筑礼乐文化相融相谐的理想图式，深刻阐释了乐为天地之和的和合思想，认为乐文化具有移风易俗而达至天下皆宁的重要功能，这不仅展示了古人的美好理想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情怀。在微观上，它力求超越阶级和个人的局限性，以理想的“先王”和“君子”为前理解，提出了“惟乐不可以为伪”的著名论断，倡导“以道制欲”，“慎所以感”，认为“乐由中出”，“乐以治心”，充分实现乐“反人道之正”的重大社会效益，这对当下的文艺建设乃至文化建设，都不无启发意义。

笔者如此阐释《乐记》的价值，绝非因为它是本书的研究对象，而是由于《乐记》乃是历时性的集大成之作，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战国到秦汉之际中国文论的最高成就。故此，我们应该把《乐记》视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予以研究和传承，而不是妄自菲薄，数典忘祖。同时，我们

① 蒋孔阳：《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6，第209页。

还应该看到，在学术史上，研究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价值，即使主观上想避免管窥之见，但客观上仍然难以摆脱以管窥天的束缚。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·哈维·鲁宾孙竟然认为，历史学家的理想“比之诗人或戏剧家要崇高得多”^①。这一结论颇有代表性。由此论之，笔者对《乐记》的研究亦难以超越自身视阈的局限。

由于时代性的遮蔽，《乐记》过于注重雅乐，因而忽视了文艺风格的多样化；强调“乐以治心”和移风易俗，但夸大了文艺的社会作用。

对于西方解构和消解经典的浪潮，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深刻地指出，似乎可以这样说，在当代哲学中，几个世纪以来的三个伟大的对话者处于我们意识的显要地位，首先就是古希腊哲人的影响，第二个就是康德，黑格尔则是第三个对话者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若我们在科学主义时代声称不再需要这些导师，这将是错误的。^②“我绝对相信的是：我们必须真正谦虚地向古典作家学习。”^③对于经典作家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毫不含糊地指出“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，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，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”，“德里达说这一番话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”^④。惟其如此，对待《乐记》这一经典文本，我们应该具有谦卑的态度，首先要努力形成个人较正确的“先见”，敞开静心的胸怀，尽量克服视阈中的遮蔽，然后走进《乐记》敞开的结构，将其纳入历时性的视阈融合之中，通过辐射思维和辐集思维的交叉渗透，力争从文本中获得更多启迪，减少对文

① [美] 詹姆斯·哈维·鲁宾孙：《新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64，第50页。

② 林贤治主编《伽达默尔集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7，第310~311页。

③ 林贤治主编《伽达默尔集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7，第427页。

④ [美] 乔纳森·卡勒：《论解构》，陆扬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，第9页。

本的误读。从理论的开放性来看，由于阐释中的见仁见智，在敞开的历时性视阈中，《乐记》的意义远没有终结。可以说，《乐记》“象一本敞开的书，它等待人们去对其作新的和批判性的研究”^①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我们缺乏对《礼记》的深入了解，还远没有真正把握文本的丰厚内涵，甚至可能会有不少误读，不知却以为知。“阅读的历史乃是误读的历史，虽然在一定场合下这些误读可以，或已被接受为阅读。”^②在笔者看来，不研究《礼记》，不关注《礼记》之礼，就无法解读《乐记》的内涵；而如果不深入研究《乐记》，也不可能把握《礼记》中礼乐相互交融渗透的文化内涵。礼乐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，一方面礼离不开乐，另一方面乐也离不开礼，因而才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礼乐文化。从根本上来说，正确解读《礼记》，这是我们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；而正确解读《乐记》，则是我们掌握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必由之路。《礼记》和《乐记》二者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，无论是阅读抑或是学术研究，二者都不可或缺。

拙著在结构安排上分为上下编，采取先整体后部分的结构。上编主要是对《礼记》从宏观的视野进行提纲挈领的阐释，对《礼记》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，对《礼记》的历时性阐释与接受以及《礼记》的现代阐释与意义生成，进行动态的审视。通过这种宏观的阐释，把《乐记》纳入《礼记》这一文本的整体加以阐释，可以看到《乐记》作为《礼记》的一篇，客观上与《礼记》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下编主要包括先秦音乐理论与

① [美] 威廉·哈迪·麦克尼尔：《西方文明史纲》，新华出版社，1992，第351页。

② [美] 乔纳森·卡勒：《论解构》，陆扬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，第157页。



《乐记》的思想渊源研究，荀子的《乐论》与《乐记》的比较研究，《乐记》在汉代的形成与接受研究，《乐记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接受研究，《乐记》在隋唐宋时期的接受研究，《乐记》在元明清时期的接受研究，《乐记》在现当代的接受研究。

目 录

· 上 编 ·

《礼记》的阐释、接受 与《乐记》的作者辨析和学科定位

第一章 《礼记》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	3
一 《礼记》的形成	3
二 《礼记》的基本内容	8
第二章 《礼记》的历时性阐释与接受	10
一 《礼记》在汉代的阐释与接受	10
二 《礼记》在三国、晋和南北朝时期的 阐释与接受	15
三 《礼记》在隋唐时代的阐释与接受	20
四 《礼记》在宋元明时代的阐释与接受	23

五 《礼记》在清代的阐释与接受	35
第三章 《礼记》的当代阐释与意义生成	40
一 《礼记》对礼的发生学叩问	40
二 《礼记》对礼的文化阐释	45
第四章 《乐记》的作者辨析及其学科定位	74
一 《乐记》的作者辨析	74
二 《乐记》的学科定位	88

· 下 编 ·

《乐记》的接受史研究

第五章 先秦音乐理论与《乐记》的思想渊源	93
一 孔子以前的音乐理论与《乐记》	93
二 孔子与《乐记》	109
三 庄子与《乐记》	115
四 《吕氏春秋》与《乐记》	123
第六章 荀子《乐论》与《乐记》	143
一 荀子《乐论》与《乐记》的关系	143
二 荀子《乐论》与《乐记》的异同	147
第七章 《乐记》在汉代的形成与接受	163
一 陆贾的礼乐思想与《乐记》	163

二	《淮南子》与《乐记》	164
三	《春秋繁露》与《乐记》	178
四	司马迁、刘向与《乐记》	185
五	班固《汉书》与《乐记》	191
六	《三略·下略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论衡》与 《乐记》	199
第八章 《乐记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接受		202
一	阮籍《乐论》与《乐记》	202
二	嵇康《声无哀乐论》与《乐记》	212
三	刁雍《兴礼乐表》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16
四	沈约《宋书》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18
五	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20
第九章 《乐记》在隋唐宋时期的接受		225
一	《乐记》在隋代的接受	225
二	《乐记》在唐代的接受	228
三	《乐记》在宋代的接受	248
第十章 《乐记》在元明清时期的接受		266
一	《乐记》在元代的接受	266
二	《乐记》在明代的接受	268
三	《乐记》在清代的接受	276
第十一章 《乐记》在现当代的接受		288
一	杨荫浏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89
二	吕骥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90
三	叶朗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92
四	蒋孔阳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93



五 蔡仲德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95
六 其他学者对《乐记》的接受	299
参考文献	307
后 记	321

上编

《礼记》的阐释、接受与 《乐记》的作者辨析和学科定位

第一章

《礼记》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

要对《乐记》进行新的阐发，就必须对《礼记》进行一番历史的梳理。只有从《礼记》这个文化系统出发，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《乐记》这个子系统。《礼记》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经典，依经立义，注重经世致用的阐释视角，追求圣人之意与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，虽然受到孔子述而不作的影响，对于礼的阐释明显具有社会政治伦理取向，但又有新的发展，即有述有作，对礼的阐释大大超越了《仪礼》的叙事性，而更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学意味。要研究《乐记》，只有注重从《礼记》整体的视角出发，对《乐记》进行全方位的辐射研究，尤其是应该抓住礼乐互动的辩证关系，才能从更深的层次对《乐记》进行新的阐释。

一 《礼记》的形成

《礼记》本来是《仪礼》的“记”，也是对《仪礼》的一种阐释。《仪礼》的“记”分为两种：一种是附于《仪礼》各篇正文之后的“记”，主要是对文本中的不详之处予以补充说明，一般没有对文本的深刻探幽；另一种是单行的“记”，各自独立成

篇，既对文本的不详之处进行补充说明，又对文本进行深刻的探幽和阐发。《礼记》就是属于第二种“记”。

在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中，最主要的经典文本就是所谓“三礼”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。其中，《周礼》是一部记载西周官制的书，亦称《周官》。在先秦时期，《仪礼》只称《礼》。《礼记》定型的时间最晚，但影响最大。《庄子·天运》篇所言孔子“治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六经”中的《礼》，即指的是《仪礼》。汉初，《仪礼》仍然单称《礼》，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言：

言《礼》自鲁高堂生。

诸学者多言《礼》，而鲁高堂生最本。《礼》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

这就是说，在西汉初年，通《礼》经的人很少，高堂生是最出名的《礼》学家，传下来的《礼》经只有《士礼》，即《仪礼》。在汉代，《礼记》由于附属于《仪礼》，而后世学者也大多认为《礼记》只是对《仪礼》的阐释。《仪礼》主要是《士礼》，共17篇。从《仪礼》到《礼记》的编辑定型，可谓源远流长，根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记载，其主要流传线索是：高堂生传徐生；徐生传徐延、徐襄、公户满意、桓生、单次、萧奋；萧奋传孟卿；孟卿传后苍、闾丘卿；后苍传闻人通汉、戴德、戴圣、庆普。至此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《礼记》基本定型。然后，戴德传徐良，戴圣传乔仁、杨荣，庆普传夏侯敬。

事实上，从《礼记》49篇的基本内容来看，大部分内容确实是依附于《仪礼》。第一类，是直接配合《仪礼》的篇目，如《丧服小记》、《大传》、《丧大记》、《祭法》、《祭义》、《祭统》、《奔丧》、《问丧》、《服问》、《间传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冠义》、《昏